

书云 著

西藏一年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西藏一年

书云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一年 / 书云著 .—2 版 .—北京 : 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02-1558-6

I . ①西… II . ①书… III .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9767 号

西藏一年

XIZANG YINIAN

书云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2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558-6

定 价 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 录

序	1
自序	7
第一章 英雄城之夏	9
第二章 失业的冰雹喇嘛	41
第三章 天葬	61
第四章 轮回路上	75
第五章 漫漫求学路	87
第六章 天寒地冻	103
第七章 我要出嫁?	123
第八章 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	141
第九章 女人、山羊、青稞酒	161
第十章 三百万声祈祷	183
第十一章 罪恶即是惩罚	205
第十二章 留住信仰	225
后记	239

序

格 勒

一

一本名叫 *A Year in Tibet* (《西藏一年》) 的英文著作在我办公桌上放了很久，作者是我已有十数年之久的好友书云，一位北京大学的高才生。我常常羡慕她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并能流畅地用英文写作。《西藏一年》是她第三部英文著作。我更羡慕她在改革开放后能走出国门，到牛津大学深造。作为一个作家和独立制片人，书云足迹遍布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千禧之年，她孤身一人沿着唐代著名高僧玄奘西天取经的道路一路采访，从西安到中亚，再到印度，整整走了一年多，写出了在海外颇具影响的英文游记 *Ten Thousand Miles Without a Cloud*，并由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①作序。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出版时，书名《万里无云》，取自佛家语“万里无云万里天”。这本书的再版掀起了国内探寻玄奘之旅的热潮。

^①阿马蒂亚·森：印度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此外，我也看过她的影视处女作《半边天》，这部影片通过一个普通家庭四代女人的生活展示了中国妇女百年的历程。正值世界妇女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这部影片于开幕式当天在全世界六十个国家同时播放，获得当年“环球南北电视大奖”最佳纪录片奖。

不过，书云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对青藏高原的眷念和对西藏文化的痴迷。我们相识于牛津大学。那时她告诉我，她写的论文就是关于西藏。我们每次见面，聊得最多的也是西藏和藏族文化。她渴望并下决心拍摄一部西藏题材的影片，为此曾跟随我进藏考察，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寻找拍摄的灵感。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藏族学者，我不但有机会经常深入藏族聚居区各地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而且有机会经常出国，到世界各地讲学、开会、考察、交流，我也曾渴望通过我的论文、专著、演讲，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一个真实的藏民族。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在西方世界，一部影片的影响远远胜过一百本书、一百次演讲。于是，我的心中也早早萌发了把我们多年来在西藏各地田野考察时的所见所闻搬上银幕的想法，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与书云不谋而合。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认真策划，我们终于有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地平线文化公司联合拍摄的电视纪录片《西藏一年》。书云作为导演，和我们的学者及摄影师等在西藏著名的古镇江孜与影片中八位普通的藏族人整整生活了一年多。这些人都是江孜卡麦乡土生土长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相互融合与冲突中，自然地选择了老板、包工头、医生、基层干部、寺院喇嘛、农村巫师、农民等各自喜欢的职业。他们与中国千千万万

农民一样，在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既有与之相适应的成功和幸福的喜悦、自豪，也有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不相适应的痛苦、困惑。我们用不带偏见的文化人类学参与式考察方法和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摄影镜头，跟踪并记录了他们在夏、秋、冬、春四季的生活故事。

二

《西藏一年》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普通西藏农民生活真实而生动的描绘，让人在感受变化中的普通西藏人喜怒哀乐的同时，对那些鲜为人知的、浸润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传统文化的描述，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方面，他们有了纠纷知道找法院审理，有疾病知道去现代医院检查，知道使用拖拉机和汽车比牛驮马拉更省事，也渴望用手机、骑摩托、穿西装、外出打工、照相留影、打工攒钱等；另一方面，他们又因背负着千年文化传统，相信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鬼怪和神灵。

他们相信自然中的每一寸土地都早已是某一个神灵之地，无论你做什么，都要通过特殊的仪式与自然中不同的主人进行沟通，于是有了书中提到的各种地方神灵。我曾在《论藏族本教的神》一文中，对这些被称为“域拉（Yul Lha）”的各种地方神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在藏族聚居区，无论什么地方，这些神灵都与普通藏族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是被当作万能超验的超自然力量来感知的。所谓域拉，即尘世之神、世俗之神、地方之神。这意味着，

普通人的安康、牲口的兴旺、气候的变化、疾病与灾害、战争的胜败等，都取决于这些神灵的喜怒哀乐，人们常提到的山神、树神、水神、家神、灶神、命神、财神、战神等都归类于域拉。在普通藏族百姓的眼里，周围的山川树木，不仅仅是自然地貌，也是与人类一样有生命、有能力影响自然和人类的地区主宰，时时处处都要小心祭祀和供养。我小时候也相信它们的存在，并跟随母亲供养这些我从没有见过的鬼神。

从辛勤的劳作到收获的欢庆，从偶然相识到终成伴侣，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僧人为逝者的诵经，从四季的交替到人生的轮回——《西藏一年》的每一个故事，都表达着书云对西藏的关注和爱。她平实朴素的描述中，穿插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古老祭祀仪式的细节，其中就包括闻名世界的天葬仪式。这不仅能提升读者的阅读趣味，更让当代西藏江孜的人和事跃然眼前，使人多了几分理解和真实感。

三

我们的电视纪录片英文版《西藏一年》自二〇〇八年三月六日起在 BBC（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连续播放之后，出乎意料地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英国《泰晤士报》给予这样的评价：“这是本年度最好的专题系列片，没有任何一部可以和它媲美。”《曼彻斯特报》写道：“该影片展示的是当今世界舆论极为关注的地区普通藏族人的生活，他们的追求和向往、他们的婚丧嫁娶、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他们的传统习俗，让我们觉得真实可信……”与此同时，一些网民通过闻名世界的视

频网站“YouTube”观看了《西藏一年》的英文版，并将观后感发到自己的博客上。他们认为，《西藏一年》让他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西藏。英国一位到西藏考察过的资深评论家彼得·高登说：“《西藏一年》给我这样一种感觉：西藏似乎并不像关于西藏问题任何一方所宣称的那样黑白分明，百分之九十的藏族人居住在乡村和牧区，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文化，保持着千年不变的信仰，这是真实的西藏。”

然而，更多的西方观众没有机会或没有条件到西藏亲自走一走，亲眼看一看。他们对西藏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自十七、十八世纪起就被一些西方神秘主义者虚构和创造出来的神话世界里。詹姆斯·希尔顿所著《消失的地平线》，就是用艺术家的想象力向全世界生动展示了与真实西藏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虚构世界。几百年来，无数厌倦了西方工业化后不断异化和竞争的人们，在对西藏的神秘想象和重复虚构中获得灵魂的安慰和精神的慰藉。因此，现代化后的西方神秘主义者，自然看不惯或不习惯看到他们虚构和想象中的精神乐园在西藏老百姓的现代化中消失。

与这种现象完全相反，书云导演的电视纪录片《西藏一年》和她的《西藏一年》这本书，都是在没有预设立场的前提下，用在西藏亲历的经验和亲身的观察，记录了一些普通藏族农民一年四季中的真实故事。但是即使是普通农民的普通生活，例如其婚姻制度、丧葬习俗、信仰与风情，在包括内地人在内的更广泛的人眼中，依然陌生而遥远。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绝无猎奇心态，更无夸张和渲染，单是以客观与公正的学者眼光去平静而敬畏地远远审视。

对西藏普通的百姓而言，传统不是宏伟的纪念碑和坚不可摧的高山，而是对过去千年的记忆，他们需要对过去灿烂历史文化的记忆，

但更需要在变化中追求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因为他们是智慧的人类。与西方普通人一样，他们需要享受现代化的生活。他们不希望把他们当作古老的文物加以收藏和展示，更不希望把他们当作虚拟中的“香格里拉”或“香巴拉”让人观摩，被人误解、误会。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几乎年年带着我的课题组成员和博士生，进藏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我亲眼看到的西藏，尤其是农村和城镇里普通人的生活，就像《西藏一年》里所记，就像《西藏一年》里所写。书云在西藏待了整整一年，跟踪八位普通人，拍摄了整整一年。西藏一年给她留下了什么？

正像她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她的回答是：“这里既不是想象中的香格里拉，也不是等待拯救的蛮荒之地。”她希望她的影片和书“能够生动而细腻地传递出藏族同胞的心声，让世人真正了解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

我相信，如果读者的视线能够穿透意识形态的迷雾，抛开千百年来对西藏的神秘宣传，《西藏一年》就会轻轻地拉近你与真实西藏的距离，拨动你心灵深处的琴弦，最终自然会让你与书云一样，为书中描述的普通藏族人的命运和未来默默祈祷。

(本文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自序

二〇〇八年三月六日，我制作的反映八位普通藏族人一年生活的五集电视纪录片《西藏一年》在英国首播，随后又在加拿大、德国、芬兰、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巴西、阿根廷、南非等近二十个国家播出。

与此同时，我用英文撰写的我们拍摄人物及其家人故事的书 *A Year in Tibet* (《西藏一年》) 也在英国出版，并相继被翻译成荷兰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

在西藏最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影片《西藏一年》和同名图书获得西方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甚至是抗议和联名上书，一些人认为，《西藏一年》是为中国政府作宣传。

一年以来，不仅世界关注西藏，中国国内更关心西藏。我很庆幸能把《西藏一年》呈献给国内的读者和观众（同名电视纪录片将陆续在全国电视台播出）。

我诚惶诚恐，作为一个汉族人，我深知自己对西藏的了解有限，以往所受的教育和国外生活的经历使我解读西藏的时候常有偏见。后来，我研究西藏历史，多次入藏考察，并且有机会和我们的拍摄

人物朝夕相处了一年，但是要真正了解藏文化和历史，真正了解虔诚而善良的藏族人，需要的时间何止一年，应该是一生一世！

书云

二〇〇九年三月于伦敦

第一
章
英雄城之夏

长空之下，英雄城外，宗山巍峨挺拔。

“阿佳，阿佳，欢迎你到英雄城。来，跟我们喝一杯！”一个身穿藏袍、剽悍而强壮的男人一手举着玻璃杯，一手向我挥舞不止。

我知道他在叫我，因为“阿佳”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姐姐”。我不由停住脚步。那男子正和七八个同伴坐在树下的藏毯上豪饮，旁边是一堆东倒西歪的啤酒瓶。他脸上那不羁而憨直、热烈又欢快的表情，让我立刻醒悟：我回到了西藏。

“到了英雄城，不喝就不是英雄！来，喝一杯！”他端着酒杯的手指着前面挺拔的宗山。

我也指了指宗山，示意我要去那里。这已是我第九次进藏，所以深知，只要接过这杯盛情难却的酒，就一定得喝下，而且要一直喝下去，一醉方休，可惜我滴酒不沾。

那男子站起身，举着酒杯，朝我大步走来。我这回可做不了英雄，但无处躲闪。放眼望去，赛马场周围绵延开去的空地和树林里，到处都是江孜城和附近村子里的人搭的帐篷，还有从方圆几百里赶来商贩建起的摊位，从堆成小山的藏北羊毛到香气扑鼻的台湾香肠，各种商品应有尽有。

这里是江孜老城边上的赛马场，江孜一年一度盛大的达玛节马上就要拉开序幕。“达玛”是跑马射箭之意，也是藏族人“过林卡”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地势开阔、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地方，搭起帐篷尽情玩乐。藏族人说，过林卡、喝茶、念经是他们最要紧的三

件事。阳光灿烂的夏日自然是过林卡的最好光景。

帐篷后、大树下，一对对男女在谈情说爱，不时听到他们欢愉的笑声。他们大胆奔放、旁若无人，让我有点不好意思，赶紧从他们旁边挤过，朝宗山走去。

宗山不高也不大，但是平地拔起，突兀、险峻。山顶上的城堡依山势而起，层层叠叠，与陡峭的山岩融为一体，白墙红檐，把人们的视线引向碧蓝的苍穹。在蓝天的映衬下，它显得庄严、威武、壮美、神圣，犹如雪山的雄狮，守望着江孜大地。

宗，在藏语中意为“要塞”，也是旧时县政府的称谓，一般在山顶。江孜老城则围绕在宗山脚下，寺庙和民居一起簇拥着宗山，像一个家族簇拥着他们威武的首领。站在江孜城的每一条街巷，都可以抬头看到宗山的雄姿，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不同侧面的巍峨形象，城与山就这样和谐地成为一体。

但是，江孜的宗山不仅仅是江孜人的骄傲。一九〇四年，英国军队从他们的殖民地印度入侵西藏，江孜百姓和军人在宗山上筑起炮台，用土炮、土枪、刀剑、弓箭，甚至放羊用的“古朵”抗击敌人，英勇抵抗长达六月之久。最后，英军炮轰宗山城堡，很多人宁死不降，跳崖自尽，“英雄城”江孜由此得名。电影《红河谷》使江孜人抗英的悲壮故事家喻户晓。宗山和山上的城堡也由此增添了许多英雄气概。

一九九一年夏，我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来到江孜。那时，江孜城里每一片树林、每一块空地，甚至十字路口，都有人在欢歌畅饮。在远离喧嚣的地方，黄灿灿的油菜花无边无际，犹如金色的海洋，一直延伸到大山深处。绕城而过的年楚河奔腾欢歌，河边绿

树成荫，野花竞放，百鸟争鸣。城里的人们似乎也要与欢乐的大自然一赛，他们的歌声让鸟儿胆怯地躲进树丛，他们艳丽的服装在蓝天白云下耀眼夺目。那一个夏天，在江孜，我不饮而醉，醉在热情欢快的人群里，醉在沁人心脾的油菜花香中，醉在美丽如画的古城。那一个夏天，在江孜，我反复问自己：我是在梦游西藏吗？

自从远离家乡独自进北京大学读书，我就渴望着超越日常生活。我开始利用假期，作一些短途的旅行，尔后，越走越远。遥远的边疆风情，绮丽的自然景观，一直让我深深迷恋。

记得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年，同学们都在讨论着毕业后的去向，不是报效祖国、支援边疆的口号激励了我，也不是支边的优厚待遇吸引了我，而是雪域高原的神秘、壮美和空灵，使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当我把想去西藏工作的想法告诉家人时，却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我想用援藏的优厚待遇说服他们，说在那里工作几年，可以入党、工资加倍，回来后，工作、分房和晋级都可优先，但我得到的是父亲斩钉截铁的回复：“不知你哪来的这种古怪念头，真是越学越傻。北大毕业，好单位随你挑，去哪里不行，为何偏要去西藏？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吗？”

在我父母眼里，西藏就是一片蛮荒之地。“在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你怎么活？牛粪烧饭，饭还不熟；生病找喇嘛念经，医院还不知是什么样……”父亲如此这般教训一通，写了满满一页信纸，提醒我进藏的严重后果，警告说，此去非丢掉小命不可。他的一席话确实让我动摇了。

一九八八年，我考上了牛津大学，但是对西藏的向往之情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强烈。在牛津，我阅读了大量关于西藏的著作：清代和民国时期涉及西藏的文献，西方探险家自十八世纪以来的记录，当然还有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所著《消失的地平线》，此书使得西藏从此成为令西方人魂牵梦萦的香格里拉。与此同时，我开始学习藏语，师从著名已故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当时，他的妻子，即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于仰光家中。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缅甸探妻，均遭缅甸军政府拒绝。他四处奔走，呼吁英国和国际社会帮助，他不是为了夫妻团聚，而是为了缅甸人民，因为早在他和昂山素季于牛津大学相识的时候，就许下承诺：“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

每次从外奔走回来，阿里斯就在家里给我和另外几个学生上课。我们从三十个藏语字母开始。宽敞幽暗的客厅里悬挂着巨幅唐卡，上面是藏传佛教保护神，桌子上摆放着阿里斯爱妻的照片，她面容清秀美丽，明亮的双眸流露出一腔柔情。我看着阿里斯忧伤的面容，并没将心思放在他教的藏语词句上，而是在思考他的命运。我曾经读过昂山素季写给他的情书中的一段话：“有时候，我很害怕在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大环境和国家命运会使我们分开。但这些忧虑实在微不足道：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相爱并珍惜对方，相信爱和慈悲最终会战胜一切。”如果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多么残酷！一九九一年，昂山素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直到八年后，阿里斯因癌症去世，他们夫妻竟未能再见一面。深爱之人阴阳永诀，人生还有更痛之悲吗？

在阿里斯的影响下，我选择了西藏作为研究的方向。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从一个世纪的卷宗中，我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